



第 28 期（总 28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CBL 国际留学教育中心首席执行官一行到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交流访问	4
“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2015 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5
朱善璐应邀参加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并发言	9
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高校及机构	11
北京大学举办首届“博雅人文论坛”	14
【教授茶座第 34 期】杨立华教授谈哲学与人生	17
北京大学召开高校团队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 2015 年工作例会	18
北京大学与地方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联动救助机制	19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理事代表团一行到访北京大学	20
中芬“教育与技术”合作圆桌会议在赫尔辛基大学举行	22

■ 网教之声

五大在线教育领域现状与先机	23
教育 2030 行动框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采纳实施	26

■ 北大人物

俞可平：要有一根筋	28
曹文轩：大人事 孩子心	31

■ 学者谈读书

顾颉刚：读书要随处会疑	42
-------------	----

钱歌川：读书的习惯 ----- 44

■ 好文共赏

专访北大社会学张静教授（上） ----- 46

■ 史苑钩沉

纸片里的半百时光：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故事 ----- 54

■ 大美北大

金秋九月廿五 燕园 初雪 ----- 57

■ 学员心声

2015 年毕业生返校感想 ----- 62

■ 编辑寄语

北京难得十一月下雪。每当第一场大雪飘落燕园，总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油然而生。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雪到燕园，当然不能错过赏雪。

这一期燕园网讯，带你走进雪中燕园。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新闻动态

CBL 国际留学教育中心首席执行官一行到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交流访问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2015年10月19日上午，CBL 国际留学教育中心首席执行官 Dr Dominik Wanner 在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董志勇、教务部副部长刘建波的陪同下率团访问我院，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关海庭，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虹，继续教育学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宁，继续教育学院对外合作办公室主

任陈瑞在燕园大厦 13 层大会议室接待了来宾。

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关海庭代表学院对 Dr Dominik Wanner 首席执行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来宾详细介绍了学院历史发展、组织构成、主要业务、海外课程等方面的有关情况。继续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虹随后对业务领域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

充,并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开办合作项目,共同培养全球化人才。

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董志勇详细介绍了学校已经与 CBL 国际留学教育中心合作开展的项目情况,并就双方可能进行的合作领域、合作业务和合作模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随后 CBL 国际留学教育中心首席执行官 Dr Dominik Wanner 介绍了双方可能开展合作领域、合作模式等进行了解

析,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创新、金融投资、城市发展、媒体管理等主题领域的培训项目资源。

接着,双方就开展培训合作的培训时间、培训对象、培训周期、培训收费等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并达成了尽快开展第一期培训项目的共识。

来源:北大继续教育学院

编辑:丁香的耳朵

“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

——2015 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京城迎初雪,四海共天涯。伴着今冬的第一场雪,11月6日上午,第十二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拉开序幕。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本届北京论坛主题设置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旨在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学术发展,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文明的繁荣进步作出贡献。400余位中外嘉宾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开幕

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



开幕式现场

朱善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是大家的一致追求，这不会因道路选择与文化差异有所分歧。当前人类社会的文化、文明与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回答和应对这三者的冲突与发展中寻求新的和谐，是全世界共同思考的问题。北京论坛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以文明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来得到中国政府与国际学界的大力支持与高度关注，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论坛主题下，保持特色并与时俱进，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朱善璐致辞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致辞中对北京论坛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了肯定。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沟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教育无疑能够发挥文明传承与创新、沟通与互鉴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教育部愿意与世界一道，以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促进国际交流与文化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为实现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而携手努力。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宣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约瑟夫·里德的贺信。里德在贺信中表示，当今世界，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依然存在，这需要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来创造更加和谐的世界，而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北京论坛则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里德进一步指出，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努力和平解决冲突、争端，“联合国在避免和预防下一次世界大战上是

成功的，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更加危险”。他还强调了联合国在结束种族隔离、建立国际法、保障人权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视频致辞，肯定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所作的努力。他表示：

“联合国旨在让所有人过上更加体面舒适的生活，消除贫困和缔造和平秩序，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帮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脱贫，也成功激励了世界其他国家，而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于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大会，潘基文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消除贫困、维护人权、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条件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未来。

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粮食安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亟待解决。面对这些重大全球性议题，我们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这方面，不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项目将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北京论坛更是提供了一个文明对话与合作交流的有效平台。

北大校长林建华代表北京大学对与会嘉宾和学者的光临表示欢迎。他指出，北京论坛坚持站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制高点上讨论地区和文明间的和谐与冲突，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回应。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考验，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北京论坛致力于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和未来走向，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林建华向长期关心北京论坛建设和发展、给予北京论坛支持和关注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北京论坛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林建华致辞

在随后的特邀报告环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现实还是幻想”的演讲。他提到，中东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类的和谐相处

离不开中东的稳定。我们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策略，摒弃冷战思维，相互借鉴，和谐共存。世界文明多种多样，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交流、互鉴、融合、合作才是正确的道路。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发表演讲

本届开幕式的主旨演讲环节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主席柯伟林（William C. Kriby），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帝文·邓（Stefan Dercon），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钱乘旦分别发表了演讲。

柯伟林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是否领导世界”的主旨报告。他从中国的近代史谈起，认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中国的教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备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袖的潜质。大

学的伟大之处在于解放自我，大学需要空间来给予思想进行自由的提问和争辩。他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斯帝文·邓结合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分析了全球和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指出贫困问题在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都依然存在。他分析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结合自己参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援助案例，详细介绍了人道主义援助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自然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风险机制和全球人道主义系统的建立来缓解，充分发挥政府和非官方组织机构的作用，避免让极端事件发展为灾难。

钱乘旦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多样化与现代化的未来”的报告，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钱乘旦回顾了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大河文明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各有特色。谈到古代中国的发展，钱乘旦认为，文明具有两个载体，即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政治上的统一与孔子学说的完美对接成为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原因；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的分离使得欧洲中世纪成为黑暗的时代；而以民族共同体为物质载体、民族

认同感为精神载体的现代国家使得近代西方重新崛起。钱乘旦又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崛起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冲击，但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多样性文明开始复兴。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明优越论”不利于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多种文明只有共荣才能共存，文明多样性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钱乘旦进行主旨演讲

“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创始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理事长、高丽大学校长廉载浩也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论坛创办于 2004 年，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有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位名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共性问题的研究，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届论坛为期三天，共设五个分论坛，两个专场和一个学生论坛，将分别探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社会创新、艺术史、城镇化、国际关系与生态保护等议题。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朱善璐应邀参加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并发言

伦敦当地时间 10 月 22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应邀参会，并受到习近平接见。

22 日下午，朱善璐作为中方代表在年会上发言。他指出，习近平主席在百忙之中出席年会，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推动中英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孔子学院发展对于增进两国友谊的重大战略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

以语言为桥梁、以孔院为窗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北大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工作创新力度、加大资源投入，努力把北大承建的孔子学院办得更好。



朱善璐在全英孔子学院会议上发言

朱善璐表示，北大是中国最为开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近年来，北大主动承担起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使命，发挥教学科研、国际交流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孔子学院的建设。迄今为止，北大已在全世界承建了 10 所孔子学院，其中，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孔子学院是办学成绩十分突出的典型代表，被国家汉办评为“全球示范孔子学院”。该孔子学院已经建立了 46 所孔子课堂，覆盖了英格兰主要行政区域，每

年在英国辐射的学校多达 186 所，受益的学生超过 3 万名。该院还在培养国际汉语教学师资、开展中英两国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朱善璐代表学校宣布：从 2016 年起，北大将每年为 5 名优秀的英国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他们到北大攻读学位；北大还将为更多的英国学者来华访问、研修提供机会。今年 9 月，北大与剑桥大学签署了合作建立中国中心的备忘录，该中心将全力支持中英两国学者联合开展学术研究。

本次全英孔子学院年会的主题是“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可持续发展”，主要议题包括“大学对孔子学院今后 5 年规划”“办学质量与特色”“中外双方高校课堂深度融合”等。全英孔子学院所在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孔子课堂所在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中方合作院校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年会。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高校及机构

2015年10月19至22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率领代表团参加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作为学校代表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此次出访，北大代表团还访问了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罗德基金会、伦敦大学学院等英国知名高校及机构，旨在了解英国高校管理机制及经验，并在已有交流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领域。

10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与参加年会的中英学校代表见面并致辞。朱善璐作为北大代表参加开幕式并受到接见。本次年会的承办方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其前身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北大共建孔子学院，于2014年与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年会开幕式上，朱善璐向习近平简要汇报了北大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共建孔子学院的相关情况，并在年会上就“以语言为桥梁、以孔院为窗口，携手开创中英人文交流新局面”为题进行发言。

在帝国理工学院，朱善璐一行拜访了校长爱丽丝·加斯特教授（Alice Gast）、副教务长玛吉·达尔曼教授

（Maggie Dallman）。双方回顾了两校合作概况，并对日后深化两校关系达成了共识。两校在优势学科方面全面合作，相关领域教授联合发表文章数量位居英国高校之首。爱丽丝·加斯特校长及玛吉·达尔曼副教务长分别介绍了帝国理工学院的治校特色及学院学科构建。朱善璐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两校在科研领域的已有合作，并邀请爱丽丝·加斯特校长出席在北大举办的北京论坛。朱善璐希望能够在两校合作中发挥北大人文社科领域的优势，与帝国理工学院强强联合。该校结构生物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全英校友会会长张晓东教授也参与了会见。

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帝国理工学院，北大校友郭留成同学作为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学生会首位中国籍主席向习近平及彭丽媛献花。



朱善璐与爱丽丝·加斯特合影

在剑桥大学，朱善璐一行访问了耶稣学院、李约瑟研究所及三一学院。在耶稣学院，双方就共建中国中心一事进行了深入讨论。2014年，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提议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中国中心，中心坐落在耶稣学院。朱善璐此行在耶稣学院院长伊恩·怀特教授（Ian White）的引导下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中心，并对中心目前建设及资金情况进行了解。建成后的中国中心将在中英关系智库、跨学科研究、学生及学者交换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就中国中心一事，朱善璐与伊恩·怀特院长于第二日赴伦敦向正在英国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简要汇报。

北大代表团此次还访问了位于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北大留学生校友墨菲特（John Moffett）作为研究所工作人员，向朱善璐及代表团成员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随后，朱善璐一行访问了三一学院，并与学院主管研究生教育副院长让·卡利法教授（Jean Khalfa）就加强学生联合培养一事进行交流。最后，朱善璐一行会见了目前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北大校友。

在牛津大学，北大代表团与该校副校长威廉·詹姆士教授（William James）

进行了深入交流。威廉·詹姆士介绍了牛津大学相关概况及他所从事的病理学及免疫学研究情况。朱善璐就此表示，北大医学部及附属医院在临床及研究方面均有较强优势，邀请威廉·詹姆士访问北大，并参观北大国际医院，希望双方能够在相关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随后代表团一行访问并参观了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中心主任、现代中国历史专家拉纳·米特教授（Rana Mitter）向朱善璐一行介绍了中国中心相关情况，并强调中心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牛津大学塞德商学院院长彼得·图法诺教授（Peter Tufano）也参加了会见，并详细介绍了塞德商学院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及哈佛商学院三方合作的“华人家族企业全球课程”项目。朱善璐表示，希望北大能够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框架下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合作领域及内容。



威廉·詹姆士向朱善璐赠送纪念品

在牛津期间，北大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罗德基金会，罗德奖学金委员会秘书长查尔斯·康恩（Charles Conn）、学者事务主任玛丽·伊顿（Mary Eaton）、发展及战略主任阿利斯泰尔·麦克莱（Aldair Maclay）参与会见。作为全球知名奖学金之一，罗德奖学金于今年首次面向中国大陆开放申请。2014年5月，查尔斯·康恩秘书长就此访问北京大学，并于今年在北大开展奖学金推介会。2015年2月，20余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访问北京大学，分别在生命科学、法律、国际关系、人文艺术、科技创新五个方面与北大师生展开交流。朱善璐一行此次回访，旨在加深北京大学与罗德基金会的合作，以期更多的北大优秀学子能够获得该奖学金。此外，朱善璐提出，希望罗德奖学金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并欢迎基金会在北京大学设立代表处，作为东亚地区的联络中心。正式会见结束后，十余名目前在牛津大学就读的罗德学者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伦敦大学学院，朱善璐一行与校长麦克·亚瑟教授（Michael Authur）、国际事务主管副校长尼古拉·布鲁尔教授（Nicola Brewer）、科研主管副校长大卫·普莱斯教授（David Price）、人

文及艺术学院院长乔纳森·沃尔夫教授（Jonathan Wolff）、语言与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克莉丝汀·霍夫曼教授（Christine Holfman）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伦敦大学学院与北大合作领域广泛，自2014年始双方陆续在医学人文、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管理学等领域开展联合研讨会。麦克·亚瑟教授及分管医学的约翰·图克教授（John Tooke）也担任了北大国际医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访问期间，尼古拉·布鲁尔回顾了两校合作概况，并详细介绍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战略规划。大卫·普莱斯针对伦敦大学学院伦敦东部新校区的相关情况与代表团一行交换了意见与看法。朱善璐表示，伦敦大学学院是北大在英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两校科研合作及师生交流密切，希望未来能够加强并创新两校合作模式。他还表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北大共建孔子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合并，使两校关系进一步深化加强，希望孔子学院也能够对促进两校合作交流发挥桥梁作用。



北大代表团一行访问伦敦大学学院

北大代表团此行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全英校友会迎新活动，伦敦及周边地区近百名校友参加。朱善璐代表母校向校友表达问候，并就学校的近期发展及120周年校庆筹备事宜进行了介绍。他希望校友会新生能够继续发扬北大精神，孜孜求学，并鼓励其他校友在所在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最后，朱善璐表示，希望

海外校友能够心系母校，对北大的发展献言献策，为实现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戮力同心、积极贡献、再创辉煌。



朱善璐出席北京大学全英校友会迎新会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京大学举办首届“博雅人文论坛”

首届北京大学“博雅人文论坛”2015年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共享的世纪：中外文学与人文学的沟通”。论坛特邀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以“文学与全球化”为题进行演讲。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王博主持。



开幕式现场

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说，北京

大学的人文学科已有百余年历史，文史哲并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北大的人文学科也从中获得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得益于广泛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现代人文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更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刘伟指出，今天的北大是更加开放的北大，在同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中，我们既要吸取优秀的成果也要寻求创新的道路。在北京大学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能使北大师生在学术共享与沟通中，增益学问、培育新知、拓展视野。刘伟表示，勒克莱齐奥先生在中国拥有众多忠实的读者，2008年勒克莱齐奥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他期待今后能有更多国内外的知名作家、人文学者来北京大学做客、讲学。

法国驻中国使馆公使、北京大学校友白良先生（Jacques Pellet）在致辞中表示，勒克莱齐奥先生是法国最知名的法语作家之一，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也是得益于勒克莱齐奥先生作品的影响。白良分享了自己对于“文学和全球化的关系”“在全球化中，文学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的观点。他说文学是全球化最早的形式之一，文学具有全

球普遍性。外交必须注重文化的交流，法国外交政策中不仅推广法国文学，而且也注重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法中是两个有着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多的文化交流，法国大使馆将再接再厉，进一步推动法中人文科学的沟通交流。

勒克莱齐奥先生在演讲中表示，中国文学直至今日，已经树起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勒克莱齐奥以儒道思想、中国诗歌、民间故事、文学作品译介和国外对汉语的研究证明，中国文学这座丰碑不仅赫然在目，而且成为人类历史卓越的贡献者。他说，中国文学回归世界文学大舞台，对于理解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人类文明至关重要。中国的唐诗随着文化间的自然传播渗入到了西方思想之中，一些民间故事也流传很广，其中有些明显源自中国文学，灰姑娘和她的水晶鞋，伊索寓言以及亚瑟王传奇中龙与凤的传说，都是中国文学在欧洲无形存在的体现。近代，鲁日满、雷慕莎等人开始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西方发现中国是世界文化巨大宝库之一。中国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启发了众多法国文人。认可中国文学，不仅是认可中国历代的文学史，更是认可它在

新一代作家与诗人的推动下在未来将发挥的作用。当今，文化交流已经成为维护和平的一大有力手段，中国文学也将继续作出其杰出的贡献。

随后，专家学者们围绕“人文学的中西视野”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题演讲，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平原演讲题目为：“‘道不同’，更需‘相为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演讲题目为：“和平的事业”，哲学系教授王博的题目为：“真空妙有之间：意义、设计和阅读《红楼梦》五个名字的解读”，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演讲题目为：“圣埃克絮佩里的双重形象与在中国的解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张旭东演讲题目为“‘硬译’与‘比较的时代’——论不可沟通性的文化意义”。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罗鹏（Carlos Rojas）、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系主任董强分别以“由岛至岛：翻译与中国”“挣脱巴别塔的束缚”为题阐述了中西视野中的人文学。

在论坛的“人文学交汇与碰撞”专题演讲中，与会者分别就 20 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第三世界文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

探讨；在“诗、思与中外共享”的专题演讲中，专家学者对“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中国古典诗词的外译与传播”“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出路”等问题进行探讨。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晓明在题为“侥幸的回归：越过现代主义的乡土转向”的演讲后，高度评价此次论坛，并对参与论坛的嘉宾表示感谢。

北京大学“博雅人文论坛”由北京大学社科部牵头，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腾讯文化联合主办。论坛旨在邀请国内外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和人文学者开展对话，就世界人文文化发展的动向、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当代责任和作用、文学与人文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相关主题进行深入探究。（文/姜南 张琳 左应仙）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未天

【教授茶座第 34 期】杨立华教授谈哲学与人生

2015 年 10 月 22 日下午，深秋时节的新太阳学生中心活动室暖意融融，这里正在举办第 34 期教授茶座活动。哲学系教授杨立华与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 20 位同学围绕“哲学与人生”这个略显深奥的主题聊得酣畅淋漓。

活动开始，有同学请杨立华谈一谈自己的哲学之路。杨立华说：“如何根本性地理解世界本原和人的本原问题，即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引领我走向哲学之路。这恐怕也是所有学者要去面对的问题。”他叮嘱同学们，不管你们将来是不是要做哲学工作，哲学梦可以暂时埋起来，但是不能忘掉，要时时刻刻去思考。

几位同学表达了一些自己对未来的困惑。对此，杨立华说道：“你们都太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答案了，这个答案需要一辈子慢慢的思考与沉淀。”他认为，本科阶段应该去想清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只要大的方向确定了以后，积累性的、技术性、知识性的东西，慢慢自然就会有。



活动现场

一些研究生同学比较关心如何正确地认识和面对学术科研。杨立华给出自己的见解，学术道路是真正意义上把自己的人生开放给一个永远的未知数。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一生的思想冒险。这个工作没有假期，不是下班了就不用想了，思考是不间断的。“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困惑是你在一步步前进的基本表现。如前人所言：只管行，只管有风，若不行一辈子也无风。你若探索必定会有困惑，你若不探索一辈子都不会有困惑。”

杨立华还分享了自己关于读经典的心得。第一，在仰视中成长。对伟大的文本你要先学会仰视，你不能因为你读不懂就说人家是胡说。当你达不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就将经典评判到一个很低的位置，这是很糟糕的。第二，带着体温

去阅读。带着生活经验去解读文本，解读完了以后又带着文本去面对生活。

活动最后，杨立华与同学们合影留念，并亲笔写下给同学们的寄语“收拾身心，自作主宰”。

教授茶座是学生工作部于2014年3月推出的一项师生交流活动。活动希望搭建师生沟通的桥梁，倡导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不谈学术、只谈人生，让老师更加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同时以老师的

人生经历、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实现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交融。教授茶座每周举办一期，每期都有不同的教授带来不同的故事，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心灵滋养。精彩不断继续，只需关注“燕园学子微助手”（pkuyyxz）微信平台，即可获知活动通知及查看历次教授茶座微语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召开高校团队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2015年工作例会

10月15日，高校团队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2015年工作例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教育部高教司、受援高校石河子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九所支援高校代表与会。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出席例会，副校长王杰主持会议。

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何慧星首先介绍了高校团队成立5年来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总体情况。经过5年的支援建设，石河子大学在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学校管理水平上有了全面提高，取得了显著进步。

“十三五”期间，石河子大学将紧密依靠对口支援优势力量，努力加强自身造

血功能建设，加快各项事业建设。

林建华表示，经过团队高校与石河子大学5年的密切配合、努力奋斗，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他指出，当前中央高度重视新疆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组长单位，任务光荣、责任重大。石河子大学地处西部，有其特色优势，下一步应当依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学科特点，以学校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提升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

教育部高教司韩筠副巡视员对北京大学为组长单位的9所高校5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她指

出，在推动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在把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责任重大、使命艰巨。教育部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从政策、资金上继续给予支持，推动工作做新、做深、做实。

各支援高校代表在会议中分别介绍了各单位工作情况及工作建议，表示将继续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责任的高度，结合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援“十三五”规划的内容要求，深入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会议还对各支援高校在对口支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文斌、副校长陈创夫和代斌，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段献忠，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周承早，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舒立春，江南大学党委书记武贵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序余，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廖明，以及各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例会。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与地方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联动救助机制

近日，北京大学联络近百家兄弟高校和地方政府建立学生资助联动平台，筹措各方资源解决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困难，通过在理论研讨、人员培训、学生救助等方面的合作，在全国形成教育扶贫的合力。

今年10月，北大学生资助中心接到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情况反映，他的母亲患有癌症且外祖母身患疾病，家中为治病欠下巨额债务，近期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虽然学校已经根据学生的经济困难程度给予了资助，帮助他解决在校学费和生活费，但家庭困难程度的加

剧还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发展。

按照北京大学相关管理办法，学生资助中心迅速联系后备军官选培办为其申请了国防生特困补助，联系法学院和学校分别为其办理了临时困难补助。为了进一步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学生资助中心通过学生资助联动平台工作机制，迅速联系学生家庭所在地民政局，致函反馈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请求当地民政局给予相关救助。当地民政局非常重视，立即按照相关法规启动了救助机制，为学生家庭办理低保补助，同时给予2000元的困难补贴，并为学生

家庭申请医疗救助提供帮助。

学生得知情况后，非常感激学校的资助与帮助，表示一定安心学习，回报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今后，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将继续完善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救助机制，急学生之所急，联

动各方资源，拓展资助渠道，让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安心在校学习，帮助学生摆脱经济困难，增强成才自信心，实现教育公平。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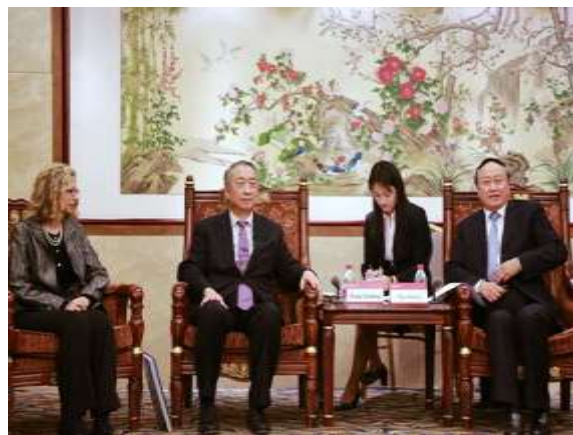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理事代表团一行到访北京大学

2015年10月24日下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章新胜、总干事英格·安德森（Inger Adersen）带领IUCN全球理事和秘书处高管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大的访问和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会见了IUCN代表团一行，副校长李岩松陪同会见。朱善璐表示，IUCN是联合国认可的唯一代表全球所有生态环境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具有永久观察员地位的国际机构，是该领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机构。北大与IUCN一直有着友好往来，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均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朱善璐希望双方能够加强科研人员的交流，从而促进北大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朱善璐介绍了北京大学作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创始发起单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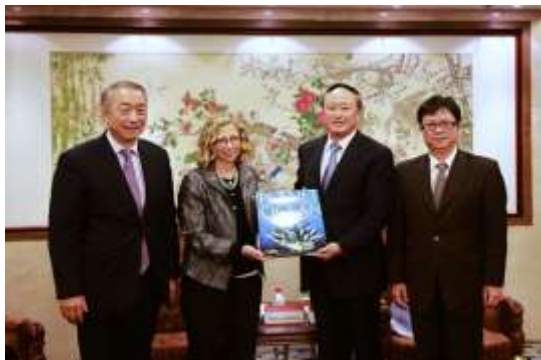
同时也是创始单位中唯一一家高校代表。自2009年起北大连续承办了六届生态教育分论坛，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生态教育网络。在2014年举行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上，北大牵头发起了由十二家世界知名高校组成的“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并于2015年7月成功举办了首届“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学生生态暑期项目，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朱善璐会见 IUCN 主席章新胜（左二）、
IUCN 总干事英格·安德森（Inger Adersen）
（左一）

章新胜表示,借此次 IUCN 全球理事及高管到访的机会,希望依托北京大学多学科优势,结合国际上关注的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贵阳论坛组织和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等方面,双方探讨开展务实、灵活、多样的交流与合作。

英格·安德森积极回应了朱善璐的合作提议,指出 IUCN 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学术和科研网络,北大已有教授担任 IUCN 委员会成员,希望北大有更多的教授参与其中。同时,她欢迎北大学生到 IUCN 实习,培养学生在大型国际组织中的工作能力,增强全球竞争力。



IUCN 代表团一行向朱善璐赠送纪念品

会见之前, IUCN 代表团与北京大学教授举行了圆桌讨论会,讨论会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主持。双方学者围绕各自的研究项目、中国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中国的角色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议题

展开对话和交流。出席讨论会的北大学者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教授张世秋,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法学院教授汪劲,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文君、王敏,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李迪华等。

背景链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联合国认可的唯一代表全球所有生态环境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具有永久观察员地位的国际机构。目前, IUCN 有 1271 个会员,其中国家成员 87 个,政府部门成员 122 个,国际组织成员 107 个,国家级非政府组织成员 908 个,附属分支机构成员 47 个。世界知名的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的 FFI-动植物保护国际,美国的 TNC-大自然保护联盟、CI-保护国际基金会、WRI-世界资源研究所等都是 IUCN 的会员。

IUCN 拥有 15000 多位自然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策咨询与制定者所形成的六大科学委员会,专注于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有关国家和地区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在全球各个地区开展近千个各类实地项目和活动,是该领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机构。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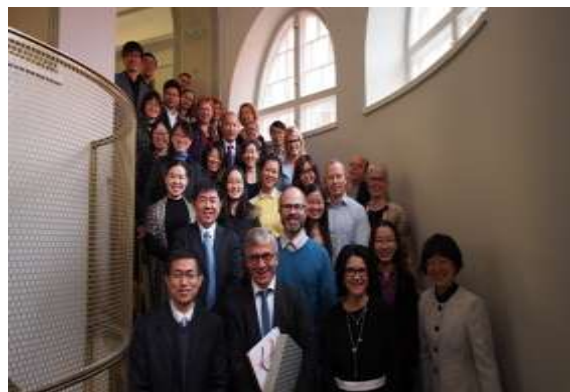
中芬“教育与技术”合作圆桌会议在赫尔辛基大学举行

中国和芬兰“教育与技术”合作圆桌会议于2015年10月19-26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举行，该会议是北京大学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长期合作交流规划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教授汪琼、贾积有，副教授尚俊杰、吴筱萌、王爱华和德国柏林孔子学院院长、北大艺术学院副教授毕明辉带领1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两校30多位师生就慕课、教师培训、移动教育、语言教育、游戏化教育、特殊教育、音乐教育、科学教育等相关主题作了27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研讨。双方在师生交流、项目申请、MOOC课程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基本确定了合作编辑英文专著《中芬教学新方法——借助技术跨越边界》（*New Ways to Teach and Learn in China and Finland — Crossing Boundaries with Technology*）的结构框架和出版计划。北大与会师生还参观了赫尔辛基大学行为科学学院、教育游戏研究中心、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Viikan Normaalioulu 完全学校等相关单位。

此次圆桌会议是继2014年11月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纯净芬兰科学对话”、2015年5月在北大教育学院举办的“中芬教育与技术双边会议”之后，又一次中芬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深度交流，为今后的持续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方会议代表合影

会议举行前，赫尔辛基大学负责国际交流的副校长 Anna Mauranen 教授和原副校长、北大合作项目学术委员会委员 Hannele Niemi 教授会见了中方代表，并介绍该校情况。赫尔辛基大学行为科学学院院长 Patrik Scheinin 教授和尚俊杰副教授分别致开幕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网教之声

五大在线教育领域现状与先机

儿童早教

•市场现状•

过去四年，儿童早教市场逐渐冷却。2014年，儿童早教市场在国内在线教育市场中的投资占比首次低于20%。国内在线早教服务的融资主要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且融资金额不大，千万元投资属于主流级别。中国约有6000万婴幼儿群体，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产品形态，在线早教的巨大市场并未得到开发，随着投资热度下降，市场步入平缓发展期。

•机会分析•

数据显示，针对家长的亲子课程拥有更高、更稳定的播放量。为家长设计育儿教育等服务可以作为新的突破点。调查显示，课堂知识型产品的活性逐渐下滑，童谣、益智游戏等产品成为最受欢迎的早教服务。将产品娱乐化，预计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国内母婴行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2万亿元，利用现有服务的流量带动母

婴电商的发展，同样是儿童早教市场重要的变现方向。

K12教育

•市场现状•

教育部最新统计显示，国内K12学生数量约为1.8亿。另有调查显示，中国K12教育的市场约为2550亿，但在线教育的占比只有18%，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过去一年，K12教育获得资本市场重点关注，投资占比同比增加一倍多。K12教育呈现多样化发展，题库、英语、家教等领域内均有产品获得千万美元以上投资。K12在线教育的竞争也在加剧。除了不断增加的创业者，传统教育机构也在布局在线教育，投资初创企业或者直接转型。

•机会分析•

O2O教育是K12教育的重要机会。上门家教或者与线下机构联合合作，都能对原有线上教育形成有效补充。一线城市内竞争激烈，二

三线城市拥有更多机会。二三线城市的教育资源与一线城市存在差距，具有资源分配优势的在线教育服务更容易吸引用户。小型传统教育缺乏布局在线教育的实力，但可以发展为在线教育平台的内容提供方，充分发挥内容优势。

职业教育

•市场现状•

过去四年，职业教育的投融资情况表现稳定，目前仍是在线教育领域内的热门投资版块。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约为825亿，其中职业教育的占比达到30%以上。官方鼓励发展职业教育。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表示未来将有超过600所本科教育转型为职业教育；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要求，未来要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国内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尚未出现领导级企业。拥有良好地面基础和线上资源的机构，未来有望发展为影响行业的平台级服务。

•机会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在线用户对资格认证、证书的需求异常强烈。资

格证书有望发展为线上服务的核心资源，能够提供认证的线上机构，其竞争力将会因此得到巨大提升。现有在线职业教育服务IT培训等聚焦于垂直领域，专业性强但服务过于分散。平台化在线职业教育将会提升用户搜索效率、降低寻找成本而获得用户亲睐。职业教育用户拥有强烈的就业需求。通过与生活服务类培训和求职平台对接，教育服务可以借此解决用户的求职需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语言学习

•市场现状•

语言学习是教育行业内长期的热门投资领域。2014年，中国在线语言学习的市场规模为193.8亿元，比一年前增长23.7%。随着从业者增加，在线语言学习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部分语言学习产品因为竞争增加，提前遭遇发展瓶颈。随着兼并收购的进行，资源越来越向大型语言教育机构汇集。功能细分的小型垂直机构，未来的生存将更加艰难。

•机会分析•

针对少儿等细分人群的英语培训服务仍存在机会，教育机制的改革也让家长对少儿英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数据显示，少儿英语培训市场的规模约为245亿元。但多数培训机构仍集中于线下，互联网化程度不高。O2O同样是语言学习领域重要的发展契机。语言培训课程在线下拥有更好的用户体验，与传统培训机构的合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线上机构和线下机构的竞争关系。作为小语种，日语韩语拥有高度集中的受众群。统计显示，国内在线语言培训领域中，日韩语种的受众比例达到16.6%。但相对数量庞大的英语培训，日语和韩语的培训机构仍属小众，且大多数集中于线下。

兴趣爱好

•市场现状•

调查显示，超过30%的用户表示在网上学习不仅是为了“参加考试”和“提升职业技能”，同时还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爱好”。与传统教育相比，兴趣教育对用户具有更强的驱动力。社会主流人群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促使兴趣培训市场的体量进一步提升。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兴趣爱好市场的规模约为500亿。

•机会分析•

因为用户不同爱好的差异性，兴趣类课程比其他课程更加碎片化。因此，平台化服务比细分服务更有优势。教育O2O模式同样适用于兴趣教育。线下活动具有更强的互动性，能够对线上兴趣学习服务形成有效补充，提升用户粘性。

来源：本文摘自企鹅智酷《跨界2》

编辑：丁香的花朵

教育 2030 行动框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采纳实施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 38 次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教育 2030 行动框架被正式采纳实施。行动框架为各国落实教育 2030 议程提供指导,旨在动员所有利益相关者围绕这个宏大的目标体系,建议实施途径,协调、资助和评审 2030 教育议程——无论是全球的、区域性的还是国家级的——确保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 38 次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教育 2030 行动框架被正式采纳实施。行动框架为各国落实教育 2030 议程提供指导,旨在动员所有利益相关者围绕这个宏大的目标体系,建议实施途径,协调、资助和评审 2030 教育议程——无论是全球的、区域性的还是国家级的——确保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行动框架是经过高度协商制定的,基本要素在 2015 年五月韩国仁川举办的世界教育论坛上一致确定。论坛发布的仁川宣言代表了各国政府和全球教育界对一个新的教育议程——教育 2030 的坚定承诺,这个议程全面、宏大、全纳且进取。

随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成员国正式采纳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技术培训等各个层面实现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强调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已收入包含 17 个大胆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包括包含教育 2030 目标内容的目标 4 教育目标。

在过去 15 年里,尽管全民教育目标和与教育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扩大教育机会方面在全世界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最终却没有全部完成。教育 2030 既要解决这些未完成的事项,也将有效应对目前和未来全球和国家面临的教育挑战。

这个重要活动是和联合国发展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性别平等和增进妇女权能署以及世界银行共同组织的一个进程的结果,旨在制定和启动下一个十五年新的全球教育议程。

部长、政府高层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来自多边和双边组织、民间团体、教育职业、学术和青年团体以及私营机构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共同采纳

教育 2030 行动框架。会上部长们和应邀出席的 2015 教育论坛合作机构领导人分享了他们关于最终行动框架的观点和承诺。

高层会议后是新书《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发行仪式。这本书包含了教育 2030 行动框架的愿景和原则，也呼吁围绕教育目的和组织学习的公共政策对

话，以确保到 2030 年实现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和全民终生教育目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助理总干事唐谦先生以及协助这本书出版的高级专家团成员之一约翰·摩根教授在发行仪式上讲话。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北大人物

俞可平：要有一根筋

每个人对母校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对北大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猛然相问，倒很难答出一个所以然来。再仔细想想，这种感情就像小时候踏过的山水和玩耍的伙伴一样难忘，姑且就称作家乡般的感情吧。

北大跟我的家乡还真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是浙江诸暨人，诸暨属于绍兴，我也可算作绍兴人。有三位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校长，居然都是绍兴人。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为北京大学。当年12月，何燮侯（1873-1961）任北大校长。他是诸暨人。北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校长当属蔡元培，他是绍兴人。北大那位铁骨铮铮的校长马寅初，是绍兴嵊县人。1919年5月4日那天在赵家楼冲锋陷阵并最先命名“五四运动”的那位北大学生、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绍兴人。还有我的执业之师赵宝煦先生，也是绍兴人。其实，我认识最早的北大老师并不是我的导师赵宝煦先生，而是著名的法学家龚祥瑞先生。龚先生是浙江宁波人，

也和我算是浙江大老乡。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后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书，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素昧平生的龚祥瑞教授写来的。龚先生早年是英国工党著名思想家拉斯基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的来信也与这有关。他在信中说，读到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我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俞可平

按照现在的通行说法，只有在北大读本科才能称为北大人。那样说来，我还算不得是北大人，因为我只在北大读了一个博士，时间是1985年至1988年。但我总是把自己看作北大人，不仅如此，而且对北大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至深，一直影响到了我女儿：她报考大学，除了北京大学外，都还没有想过要报考其他学校。我一位在清华大学任领导的老朋友劝女儿报清华，她也无动于衷。我太太都埋怨我了：都是你闹的，女儿现在都一根筋要上北大。

说起一根筋，我倒认为一个人也好，一所学校也好，经常需要这种“一根筋”的精神。想想我自己对母校之所以会有一种家乡般的感情，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在自己心目中一直有一根北大的“筋”。我所认可的北大这“一根筋”，就是母校对知识与学问的尊重，以及自由与宽容的氛围。

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地方，它培养社会的各种专业人才，最受尊重的应当是学识而不是官位。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词中，他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

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赵宝煦老师在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涯时，谈到著名政治学家、时任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先生。赵先生今年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他记忆犹新的是，张奚若先生在学生迎新会上这样说，人家说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你要是想升官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你，你走错了门。你要升官你上中央政治学校去，你到我这儿来，当官的门儿都没有。我只能教给你一个读书和研究的方法。

蔡元培校长和张奚若先生的这“一根筋”显然被赵宝煦先生传承了下来。有两件事我至今难以忘却。一件是，现任科技部副部长的张来武同学当时组建校研究生会，想请我主持研究部的工作，我去征询赵老师的意见。他对我说，你最好一门心思做学问。言下之意，不自明。我听从他的教诲，在校期间便不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另一件事是，赵先生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有革命资历，建国初就任北京大学的系领导。在我从学于他期间，上级曾任命他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但他没有干多长时间便辞职回校了。他说，他对那里的一些人和事看不惯，惹不起但还躲得起，这个

副院长不干也罢。“一根筋”一发作，他便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想想有些人为了争得一官半职，而无所不用其极，差距何止千里！

赵老师的这种“一根筋”态度也影响了我。我内心十分厌恶那些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想当官的人，也像赵老师那样不怎么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当官。对那些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学问家和思想家则崇敬有加。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原西北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比较熟悉，对他我也格外敬重。一方面是因为张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前辈学者，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也有种“一根筋”的精神，与他交谈时他对投机钻营官僚的鄙视每每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有人还告诉我一件张先生崇尚学问看轻官位的趣事。说有一次西北大学校庆，主持人介绍学校的业绩时大谈培养了多少高官，而不谈培养了多少人才。身为校长的张先生实在听不下去了，居然不留情面离席而去。在“官本位”文化如此浓重的氛围下，这种“一根筋”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不鼓励自己的学生当官，鄙视削尖脑袋想当官者，当然不是说就看不起官员，或者轻视政治家的作用，也不是要

去阻止学生从政。大学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也包括未来的政治人才。研究政治学的人，想必没有人会否认伟大的政治家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德才兼备、政绩突出、正气凛然的官员，同样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尽管赵先生鼓励我们做学问，但其弟子中仍然有许多进入了党政部门，成为政府官员。不久前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同学，就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先生对郝平学弟一直是关爱有加，赞扬不止。我自己虽说一直没有离开学界，但从身份上说，首先也是一名党政部门的官员，赵先生似乎也从未对此有过微词。可见，北大的这种“一根筋”不是不宽容，更不是不通情理。我所熟悉的这些有着“一根筋”的师辈们，恰恰无一例外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宽容有余，威力不足。

宽容就是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美德。前辈乡贤蔡元培校长当年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治校，留下了千古美名。“思想自由”是一种政治环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兼容并包”则是一种政治的和道德的宽容，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我上学时，北大的这种自由而宽容的精神在那些老一辈先生的

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做博士学位论文，用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几乎没有参考系里哪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引起争议在所难免。参与论文审阅和答辩的张汉清先生、陈哲夫先生、李景鹏先生等，可能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对论文的评价。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据说现在有一种相当不好的风气：学生做论文时要格外注意引述评审人和答辩人的观点，否则可能会通不过。

时下人们在称呼别人时，如果对方的职务带这个“长”那个“长”，那多半就称官职，如果不带“长”那就称个“老师”，而不管对方是否真是学校老师或曾经做过老师。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们称系的领导，都不称职务。我在北大国政系就读期间，赵宝煦、张汉清、李景鹏诸位先生都做过系主任或副主任，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当时若叫他们为“赵主任”“张主任”“李主任”，

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对这些当年已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系里的年轻老师和我们这些研究生，背后居然都对他们“宝煦”“汉清”“景鹏”般地直呼其名。是对这些老师不尊重吗？当然不是。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外加平等和亲切。

说着北大的这些事，想着老师们的这种“一根筋”，有一种既遥远又亲近的感觉。毕竟过去二十四五年了，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大也不例外，许多东西或许已经事过境迁了。但北大依然在未名湖畔的燕园里，指导过我的那些老师也都在八九十岁上下了，一个个都健在，有几个还精神矍铄，记忆中的这些事又仿佛并未逝去。母校的这“一根筋”应当还在吧？（作者：俞可平，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186期）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曹文轩：大人事 孩子心

生命中有两种状态：一为夕阳下坐着，一为披星戴月地做着。坐着意味安享，做着表明进取。似乎做好后者的，才有资格再去做前者。

曹文轩必定是后者。

他记忆力惊人，几个月前，我曾参加过一个他出席的研讨会，本以为早已湮灭在其浩如烟海的日常事务中，没想

到一见面，他却笑着张口喊出我的名字来。

他当然是讲究的。比如，他会大方地告诉你他有几个衣柜，浅色领带与细纹衬衫比较搭配，何种场合要穿戴何种衣饰。这在后来与其妹曹文芳交谈时得到了印证。

作为恩师，学生李朝全和师力斌终身受益于老师低调为人的处世风格、谨言慎行的学术态度和手不释卷的创作热情。

而曹文轩说，光阴能改的是容颜，改不了的是孤意与深情。

越是孤意，越是深情。

——引言



草原

继 2005 年出版《青铜葵花》后，时隔 10 年，曹文轩的最新长篇小说《火印》出版。

不同于曹文轩以往作品中的江南背景，此次他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草原上，一个男孩和一匹战马的传奇经历，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对罪恶的批判，也有更重要的温情和友爱。

2015 年初，出版社邀请曹文轩创作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与他的创作想法不谋而合。

曹文轩说，创作灵感来自一次随手重翻萧红的作品——《旷野的呼喊》。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他看到一段文字，说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主人公看到有几匹马向他这边跑了过来，心想应是有客人骑马来这里，没有将缰绳系牢，让这几匹马跑了。于是，主人公呼唤马，想在马跑过来时将它们抓住。可是，当马跑到面前，他去抓缰绳时，手却又立即缩了回去——他看到，马的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

“看到这里，我心里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有什么宝贵无比的东西被我一眼看到了。萧红只寥寥几句，似乎只是无意写到，而且后文再也没有提及此事。这个细节看上去与整篇作品关系并

不十分紧密。但看完这部短篇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部角度独特的长篇小说。”曹文轩说，在他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场景，其次出现的就是日本人征用马匹的场景，他曾经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过这一历史事实。

在《火印》中，曹文轩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一个叫野狐峪的小村庄为背景，男孩坡娃与他的那匹叫雪儿的马过着和谐宁静的田园生活。日军的铁骑踏上这片美丽的草原后，雪儿被掳走，一个日本高级军官想要把它训练成自己的坐骑。雪儿因不屈从而遭遇种种磨难，被迫去给日军运送大炮。同样遭遇磨难的还有坡娃和野狐峪的村民，日寇将大炮对准了这个村庄……几经坎坷，坡娃与雪儿再次重逢。但雪儿重新回到野狐峪后，一直低着头，因为，是它拉来了那些大炮。

“《火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份简单的抗战材料。”在《火印》中，日本军人的形象占据大量篇幅，曹文轩既揭露和抨击他们的残忍与不义，也关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审视的。

曹文轩的文字大多关乎人性，这似乎与他的成长经历不谋而合。他出生于

江南水乡，其作品一贯以南方为叙事背景，这次书写北方草原对他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作品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草原的四时风光和风土人情——日出、日落、微风、雨雪、草原、密林、大山、断谷……串联起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情画卷。

曹文轩的一位朋友在看过《火印》后评价，他“在写草原时，就像写水乡一样自信”。曹文轩说，这是因为自己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张北一带的草原风景，“我已记不清这些年我驾车去那一带有次数了，那里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河北人保护了自己的旅游资源，那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美不胜收。尤其是坝上的风景，令人惊叹。”曹文轩好友、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安武林回忆道。

有一年，曹文轩带着安武林前往坝上。沿途的山、树木、田野，都是风景。天很蓝，阳光很明亮。

突然，曹文轩喊道：“武林，快拍！”

“我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他说的风景在哪里。侧身一看，那光秃秃的沙漠上，只有一棵绿树在摇曳。正前方一点风景都没有，只有柏油路。这有什么可拍的？”仅仅一棵树，安武林犹疑着，

但还是摁了几下快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错过的风景之一。在一本内蒙古摄影家的摄影集里，一棵树一片沙漠的照片，很美。”

车又停在一片草甸前，越过草甸，便是一汪湖。几头牛悠闲自在，或啃草，或散步。曹文轩走到一头躺在地上的花斑牛前说：“武林，给我和牛拍一张。”

曹文轩望着牛，微笑着。牛也望着他，似乎认出了他是谁。“他喜欢牛，对牛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纯朴而又天然的情感，我很少在其他作家身上看到。”安武林说。

阅读

12岁的曹文轩，清荷出水的年纪，一切清明澄澈空寂。

盛夏，苏北。吱吱呀呀的橹声、渔人噼噼啪啪的踩板声（催促鱼鹰入水）、老式水车的泼刺泼刺声，深深浅浅的情愫像月亮下的一汪湖水，兀自幽深无言。

曹文轩对幼年贫穷的记忆极为深刻。没有吃的，母亲就让他从河边割回一捆青草，然后放进无油的铁锅中认真翻炒，做一盘“炒韭菜”。

初二那年，曹文轩冬天穿的棉裤“漏洞百出”，破掉的洞里会吐出棉絮，甚至还会露屁股，这使他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经常下意识地靠住墙壁，或

是一棵树。“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因为棉裤上有破洞而被人耻笑的气愤与尴尬。”

这段苦难的乡村生活，根植于曹文轩的灵魂深处，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他的一切。

在作品中，曹文轩无法摆脱对乡村生活的追忆与留恋。“难怪福克纳会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这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真实和贴切。”

虽然，曹文轩的作品大部分是乡村题材和过去的事，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在当下是过时的，“从前”也是一种现实——从前的现实，它与今天的现实具有同等的意义，并且由于历史的沉淀，我们会对从前的现实有更深切的把握。因为，人类的基本人性或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及基本的审美欲望，是不变的、永恒的。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说，一个作家只有尊重自己的经验，写他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出最真实的作品。

1977年秋，曹文轩大学毕业，借“深入生活”之名，他回到了苏北老家。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晃悠了一年多，他才又回来，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自己的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有原因——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

“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曹文轩说。

在北大留教的曹文轩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写作。除了研究工作，他常常把目光放低，关注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现状。

“儿童读物数量猛增，但质量严重下滑，浮躁的社会心态冲淡了阅读的意义。”数月前，对于当下青少年的阅读环境，正在武汉参加第14届华中图书交易会的曹文轩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也提出了解决办法：通过朗读，让孩子感受文字之美，从而产生阅读兴趣。

尽管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被重印约300次，《青铜葵花》被重印170次，但他仍认为，中国的阅读现状比其他很多国家要糟糕，很多大人自己并不读书，却会在打麻将时，扭过头冲孩子大喝：“读书去！”



读书去，读什么书？怎么读？曹文轩说，与其让孩子读一些言之无物的书，倒不如让孩子多去看看天空的太阳和月亮，通过感受美对一个事物产生兴趣。

阅读也是如此。

曹文轩在图书会上的讲座以故事开篇——

“在巴西的大草原上有个牧羊少年，他接连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藏有一批宝藏。少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非洲，穿越‘死亡之海’撒哈拉大沙漠，其间奇遇不断，经过一年多的寻宝历险，在他拼命挖宝藏的时候，一帮匪徒夺走了金子，扬长而去。其中一个匪徒还讥笑他说：‘我也连续做了两个梦，我梦见在你们巴西草原上，就有一大批宝藏，可我决不会因为一个梦就跋涉万里。’牧羊少年只好原路返回，峰回路转的是，他在巴西的牧羊地处挖出宝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脚下。”

曹文轩分享的故事，正是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他用这个故事，启发小读者：成功不在远方，就在自己每天的阅读与经历之中。

有一次，曹文轩与小学生做交流活动。课堂上，语文老师点一个小男孩起

来朗读：“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

这是曹文轩自己的作品，但稚子童音让他听得流泪，这个班上五十多个孩子都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浓厚兴趣。“原来可以通过朗读，把孩子从声音世界带到文字世界。”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着社会普适文化，遵从着社会规范，从一个“生物人”变成“社会人”，“但确实需要引导孩子们寻找个人的生活目标，探寻个人的兴趣爱好，实现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与幸福息息相关。”曹文轩说。

曹文轩提到了自己的代表作《草房子》，他现场问大家，主人公是谁？孩子们纷纷在下面答：桑桑！

曹文轩说，不对不对。接下来，一个孩子说：“是曹文轩！”这正是他要的答案。

“《草房子》的主人公就是小学时候的我，《青铜葵花》的主人公就是中学时候的我。”能够如此坦诚地介绍自己的作品与写作秘籍，恐怕也就只有曹文轩了。

曹文轩告诉孩子们，苦闷于不知道写什么的人，就像那个牧羊少年，他奔赴远方，寻找答案，实际上答案就在自己的脚下。“自主阅读是一条拯救心灵的路，它可以让人回归自我，认清自我，然后重新出发。”

信仰

“今天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十余年前，曹文轩经由学生推荐，接触到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的一句“混乱的时代”，让曹文轩更加坚定了自己孤独的思索，也用更加清醒的言行去厘清自己身处的充满相对主义的云山雾罩的文学批评界怪象。

“我一直对我的想法很怀疑，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的无知、浅薄和平庸？为什么我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由此，我惶惶不安。我会想，听者是不是在暗地里嘲笑我？”不久前，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学何为？”讲座上，面对大学生、慕名而来的家长、高中生以及一些进修教师，曹文轩敞开心扉，用心灵与听众对话，让一个个生动的文学范例直击心灵。

曹文轩曾经惶惶不安的想法，是关于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等等。他发现，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想法，无论是对文学的认知和解释，还是对观念的叙述，都与他惊人一致。

曹文轩认为，小说应该当成艺术来鉴赏，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的文本。“比如说契诃夫，契诃夫之所以重要，关键是他的小说是艺术品，而不只因为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批判动机的思想家。”

在今天，为何要重谈文学？文学是什么？一个本是常识的问题，在曹文轩的心里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批评家的心机，全在比试理论上。”

曹文轩感慨，文学批评的园地里，没有文学，只剩下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文学家的身影荡然无存”。“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一部作品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解读思想。难道只有思想一个维度可以评价作品的高下吗？审美之维、情感之维、形式之维呢？审美、情感、形式就比思想低下吗？”

曹文轩从自身的创作经验谈到作家写作实际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物、题目、细节、结构等。他把作家比作木匠，写作时关

心的是“手艺”：情节怎么发展？人物怎么变得更加可信？章与章怎么连接？下面怎么写？“所以，阅读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应该做一个阅读者，其次才是解读者。”

“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都摆出一副战斗姿态，憎恨空气四处弥漫。原本，没有人怀疑文学本身是什么。现在，文学性都成了问题。中国的不少文学批评家，好像更应该划归哲学所、历史所、社会学所等等，不该在文学所。很多研讨会以文学的名义召开，身处现场，你会误以为不小心跨进某个社会问题的论坛，充满对经典的憎恨。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怨毒文学’。文学离不开仇恨，仇恨是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可以公开，甚至是高尚的情感。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怨毒文学，混杂着卑贱、邪恶、肮脏等下流品质，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严重失衡。偷窥、淫乱、暴露癖等，是小人的仇恨。文学可以有恨，不能有这样四处游荡的小恨。这面肮脏的大旗帜上，只有唾沫和浓痰。”

这番言辞，道出了一位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几十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心声。曹文轩追究原因：超级相对主义是罪魁祸首，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用一个短促的反问句

击倒人类千年苦心建立的陈述句，文学性成为一种历史叙述。

“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享受着思想深刻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知识分子扮演着满腹狐疑的形象。

谈到文学的根本意义，曹文轩用椅子做比喻，椅子形式很多，但功能是一致的，粗鲁地说，也就是“安放疲倦的屁股”。文学呢，其根本意义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人性的基础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一方面，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今天，文学的力量可能不如从前，但它的意义却愈加凸显。

“文学能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从《追风筝的人》《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学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能帮助人类养成情调。

“情调属于美学范畴，美的意义并不是谁都能意识到。人们在意的可能是思想、知识。当下，美成为被放逐的对象，美成为一个矫情的职业。”

曹文轩表示，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实而言，“美的缺失，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是把丑与脏混为一谈、把虚伪与假混为一谈。”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通过写厕所去证明写作的真实感——

“我常问，究竟怎么了？作家为什么不能谈崇高、谈美？谈悲悯，成滥情；说风雅，成附庸风雅。我们在玩命地追求真实。同样是写厕所，马尔克斯笔下的厕所，有着前列腺出问题的老人对青春已逝的伤感。而我们的作家写厕所的时候，后面有这样的思想含义吗？没有。”

这是美在文学中缺失了。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建筑、服装等其他领域，美也缺失了：学校的审美教育已经窄化成音乐、美术课程。

曹文轩看到，江浙农村，发达了的农民用毕生积蓄盖起一座座丑陋的建筑，砖头外面是水泥，水泥上面再贴瓷砖，白色的长条瓷砖，中国中小城市的街头厕所就常常贴那种瓷砖。房子空间最大的留给卧室，而不是客厅。

中国人在海外购买奢侈品，广为流传的口头禅就是“还有吗？”问得外国店员目瞪口呆，惊讶“这个国家怎么富成这样，怎么有如此强的购买力”，而

与此同时，国外的很多景点都有汉字书写的“请不要大声喧哗”。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极端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保留一份体面呢？”曹文轩的最后亮剑还是落到文学上：“我把悲悯情怀看得很重要。悲悯永远是文学的基本精神。”

童心

或许，曹文轩的悲悯情怀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故里水乡。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故乡最美，不仅是现实生活场景上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迷恋；不仅是表象的迷恋，更多的是对于美好人性的迷恋。”在曹文轩眼中，那里的人，虽然贫穷却善良质朴，虽然自身不够强大，却总是乐意去帮助别人。

曹文轩一两岁时，经常被邻居抱出去玩，然后沿着村庄的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他找回。

但当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时，却不肯再喝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乳汁喂饱了曹文轩。“这奶水里面，一定包含了很多慈母的善良、慈爱和关怀。正是这些家乡的人，让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他们的善良和朴实，构成了清洁的人性之美，

他们心灵里面的真善美构成了我创作的主要基调。”

在名为《肩上的童年》一书中，与曹文轩相差13岁，如今也将写作作为安身立命的妹妹曹文芳真实记述了兄妹的童年故事，“哥哥很严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几乎不太帮我。只是给我开书单，要我多读书。但我明白，他希望我厚积薄发。”曹文轩的勤奋一点一滴地印在妹妹眼里。

闲时暑假，深夜起床，书房的那盏灯下，曹文轩亦写作亦读书的背影让曹文芳为之动容。“哥哥常说，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书和写东西。他的写作天赋很高，第一次初中写作文时，就在小镇的作文比赛上拿了第一名，满满一个作文本就写一篇作文。”

也是从那时起，曹文轩开始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本子，唯有一点特殊的是，本子不能太平凡太普通。深谙此事的安武林告诉我：“这倒是和他儒雅的气质如出一辙。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唯美主义者，这个小爱好便是一个小小的佐证。”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喜欢各种漂亮的稿纸，喜欢各种别致的信封，喜欢新颖的本子。这种爱好有点像农夫

爱农具、士兵爱钢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西方某位作家对稿纸的“挑剔”，写小说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诗歌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散文用什么颜色的稿纸。

曹文轩外出讲课、参加会议、出差、回故乡，皮包和行李箱中，必然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阅读的书，一样是随时可以写点东西的小本子，这种爱好显得既古典又文雅，是书生的一种标志。

“他喜欢本子，喜欢得有点痴迷。”如果你足够细心，便会发现一个动人的细节。会议上，曹文轩和朋友熟人打完招呼以后，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他会小心翼翼地从小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似乎那是古代易碎的名贵文物，然后再轻轻地打开。

“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本子，昂贵的、廉价的、大的、小的、白色的、彩色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书写的舒适度好，一类是富有创意的，像艺术品一样。但他对待本子的态度却是以实用为目的。”安武林对此颇为熟络，如果你能看到有同一种本子，10本以上的，那就是他自己买的。“曹文轩买本子，很有一种一掷千金的派头。

一买，就是一摞，一打。绝对不会只买一本。”

本子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曹文轩的字本来就很美，精致秀气，似乎只有这样的本子再配上他的字，才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般配。

而在此前，曹文轩一直喜欢各种稿纸。1995年，江苏新华书店搞作家人文校园行，他开始去校园讲课了，觉得带稿纸不方便，所以，改用本子。从此以后，他写任何东西，包括创作，都在本子上书写。

许多人问曹文轩累不累，这就如同一个笑话，你见过一个孩子喊累吗？如果“玩”是一种工作，那么所有的孩子都是工作狂。

曹文轩获得的奖不胜枚举。2015年3月，他的长篇小说系列《丁丁当当》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评为全球最优秀的儿童读物。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避讳谈及故乡，那是苏北的一个村庄，家里有父母亲 and 妹妹们，他很小就开始烧菜、做饭、扫地、洗碗、养鸡、养猪、养鸭、帮父母带孩子。

很多年以后，曹文轩在学术上、文字里、高校中自如穿梭、游刃有余、野蛮生长。而这一切，在他看来，仅仅是

因为自己还保有一颗童心，真诚、自在、好奇、探索。

一个孩子就是一台永动机，一个孩子永远令人稀奇。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文/李珣璐）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学者谈读书

顾颉刚：读书要随处会疑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

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

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

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来源：中国好书

作者：顾颉刚

编辑：丁香的耳朵

钱歌川：读书的习惯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校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会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理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餐，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做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

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酬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

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直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 5 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 100 个 5 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整天。我常听见山与支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 5 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之。至于在节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戏，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

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蹋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来源：做书

编辑：丁香的耳朵

好文共赏

专访北大社会学张静教授（上）

=专访笔记=

我们原本设定的主题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是考虑到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到成为了“学科无意识”的程度，要唤起大家对这个词的“想象力”似乎还是有别的讲述方式才好。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一书最后的附录“论治学之道”给了我们灵感：为了展现这种似乎略带神秘感的能力，还有什么比一个成熟学者的成长经历和学术实践更具说服力呢？还有什么比一位成熟学者的学术经历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社会学想象力”呢？带着这个想法，我们找到了国内政治社会学的执牛耳者、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张静。

张静老师在我们眼中一直是个气场强大的人。但是这种气场不是体现在那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上，而是更多展现为一种理智成熟的自信。她讲课总是条理分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清晰可辨。但是这种条理清晰却不显呆板，因为她极具穿透力的概念一旦接触现实社会的例子，就如同快刀切萝卜片一般

干净利落，作为听者常会有一种理智上的刺痛。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除了看到了张静老师在课堂上的冷静睿智、条理清晰，还见证了她的另外侧面。从开始联系张老师，她就表现了极具儒雅气质的谦虚、耐心与配合。采访的时候她以嘘寒问暖开始了和我们的交流，让我们很快就消除了内心的些许紧张。临走的时候她还不忘往我们手里一人塞一个酒心巧克力。最后整理的访谈稿，张老师则百忙之中抽出空来亲自修订，经过她的修改，稿子变得更加凝练和可读。自始至终张老师没有让我们感到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学生，她给我们平等的对待，让我们感觉像她的老朋友。和她对话是一种享受。由衷感谢张静老师！

为了达到“以一位学者的经历来具体呈现‘社会学想象力’”的目的，我们的访谈集中在四个主题：求学史、教育、学术生活、当代青年人的选择。尽管我们从头至尾一次也没有提到“社会学想象力”这个词，但这个没有出现的

词却是我们整个访谈最核心的关注。张静老师用她的人生体悟和学术实践生动诠释了一个道理：学术和人生，原本就是彼此成全的。

=专访记录=

问：看了您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您工作和求学的经历是交织在一起的，您一般是在工作一段时间才去接受教育深造，这是一个刻意的深思熟虑的安排还是当时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张：不得已的。我觉得这点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是一直就学呢还是中间工作一段。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不一定有这个选择。比如说我高中毕业首先到西藏军区当兵，然后我当兵两年的时候赶上了恢复高考，因为我是 76 年当兵的，第一期的高考是 77 年。然后 77 年的时候就考了两届，77 和 77 级是在同一年考的。因为我又隔了半年，所以我考的是 78 级。我在 76 年当兵的时候还没恢复高考呢，所以根本不可能（上大学），后来正好赶上了高考而且是在比较近的时期，因为更多人工作时间比我长，下乡啊干什么的。等于说我是刚刚工作第二年就恢复高考，然后我们就开始考。我本科毕业的

时候是 82 年 7 月。我是穿着军装上的本科，是从部队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还不让你脱离部队。所以大学里头很少，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当兵的。这种现象只有 77、78、79 三个年级里有，以后就分流了。就是说地方可以考部队院校，你就成了部队的。然后部队的一般来说是不能考地方院校的。因为部队院校也开始发展。只是在刚刚开始恢复（高考）的时候允许我们考地方院校。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川大很少穿军装的人，女兵就更少了。

问：当时您在学校是作为军人的身份吗？

张：对呀！我记得我们西藏军区那一年的名额就考上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当时军队司令还是副司令的女儿。但是她也是在我们医院，等于说我们只考上了两个人，但她考的是医学院。

问：那个时候录取比例非常低了，应该是二十几比一吧？

张：它给部队一些考的名额，你考上了你就上，你没考上你就不上。让你考地方院校。后来我考到川大。

问：老师您本科是读哲学的，后来怎么又转到社会学的呢？

张：我上本科的时候没有社会学，各个大学都没有社会学系，社会学系还没有恢复。社会学是在哲学系里面教的，但并不作为一个专业。之前没有社会学系，比如孙立平是中文系的，王思斌老师等都是哲学系什么的，都是别的系的。我当时在上本科的时候虽然是在哲学系，但是就对费孝通的书非常有兴趣，读到他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学科叫社会学。后来本科毕业我不是又回去了两年嘛，因为我是部队的，所以我必须要回去。回到单位之后我决心再读，那时正好就恢复了社会学。南开那时候建了一个叫“黄浦班”，现在你看到的五十多岁的社会学者差不多都是那个班出来的，但不是同一级。我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三级，比孙立平他们要低。孙立平他们应该是第一级。他们是从各个不同的系来选调，因为没有社会学嘛。他们是从哲学系、经济系、中文系、新闻系等各个系选调的，所以像孙立平就是从北大的中文系新闻专业选调过去的。然后我们就属于考了，它就开始考了，向全国考研。我就报了那，从那毕业以后我就决心离开部队到大学，后来我就去了人大。

问：当时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在部队里面一直工作下去，而是想着要接着深造？

张：其实当时部队的条件比当时很多地方都要好，而且如果在部队一直工作的话发展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做出这个选择最主要可能跟个人的特质有关系。比如说有的人更愿意做一些行政工作，那他/她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的地方来发展自己。但是我在读了本科之后，特别是在读了研之后，我非常喜欢一种学习的气氛，周边人都在学习的这么一种气氛。这种地方只有大学。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这种生活方式里所干的那种事情，那我就决心要去大学。因为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大学，除了当兵那是不得已的吧！之后要么是读书，要么是在大学教书，基本上就是在大学。

问：您在工作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我觉得应当说对中国的了解比完全没有工作的人应该多一些，尤其是去过边疆。因为那地方完全不同于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所以有一些多元的背景我觉得它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但是你说直接的有什么影响，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是我在部队呆的时间其

实很短，还分成两段。我虽然穿军装，但是我在上大学，我已经在成都了。我在成都上了四年，我虽然算是部队的，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在西藏，我是一个大学生。我真正在西藏的只有四年，还分成两段，之前有两年，过后本科毕业又两年。所以相对来说其实我的时间很短。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你打算要上大学，或者打算进大学工作，你并没有一个长远的观点要在那扎扎实实开始观察周边的那些。这是一个比较过渡性的，一个是时间太短、太年轻，就没有打算把那作为一个事业的基点，所以我觉得影响不大。但是，到现在有很多人看到我都会问我‘你当过兵吧’，这说明他们还是看得出来一些东西。有的人说走路像军人，有的人说气质上像军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就是别人完全不知道我背景的都能看出来，那说明那段时间还是有影响的。

问：前段时间我跟郑也夫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认为那种在社会上历练过的一些学者，比那些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或者博士后的那种学者，相比之下，前者更有一种对生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观察力。

张：我同意。

问：有同学跟我说，感觉自己读社会学读了这么多年，好像离社会越来越远了。您觉得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是这个学生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学教育出了问题，还是说社会学学科本身可能存在着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张：我觉得后两者的问题要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其实是一种精英教育，从传统来说。换句话说，教育就是使人脱离他原来的社会地位，进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取得更高的身份。比如说你们北大毕业以后，基本上你们就进入中产阶级。你不可能再回到你原来的比如说——从基层来的——农村、乡镇，从基层来的这些地方也基本上不会再回去了。基本上都会进入中产阶级。这就是教育的作用。而且人们为什么读书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包括他的职业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身特有的一个功能。所以教育本身会使人脱离大众的。这个我相信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这个特点。这是其一。第二点，中国的教育还有它更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践性的教育，而主要是一个书本教育。这个就更使你脱离社会生活。比如说你去其他国家的城市，你去看博物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中小學生跟你一起看。还有

老师坐在地上，围成一圈就跟他们讲，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就在讲艺术史或者是在讲美术。他们是实践性的教学。比如说你去看演出，你也会发现有很多中小学生在了一起在那看。因为他们也是在学习，通过看戏的方法在学习。我在哈佛的时候，肯尼迪学院的考试是这样的。比如说博士毕业的答辩生坐在这，这一排考试委员坐在这，那次我参加的是一个环境方面的博士项目的一个毕业生答辩。他说假定你是克林顿总统的助手，你负责的是环境的项目，克林顿现在要到联合国有个演讲，要讲美国对于世界环境变化的看法和一些政策，他要咨询你，你会有什么建议？我当时在的时候克林顿是总统，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问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实践性的。这跟咱们的考试内容完全不同。比如说他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考试，不是考试，教学它怎么教学，这教学完全是实践性的教学。比如说，我记得那个 Toniest 上课是这样的：先让学生报号 1、2、3、4、5，然后这个再 1、2、3、4、5，就自己一个人 1、2、3、4、5 这样，这样全班所有 1 的人组成一组，所有 2 的人组成一组，而且是分散的，因为你跟谁坐在一起是随机的，你不可

能跟熟人在一个组里头，因为他是这样报号的，这样就组成了 5 组。然后，他说你这个组是河南省委，他这组是贵州省委，然后这一组呢，比如说是山东省委。然后他就告诉你，河南它的经济条件、它的 GDP、它的这个人口的分布状况，它的那个工业或是农业的一些特点，它现在存在哪些棘手的问题。贵州也一样，山东也一样，它都把这些省的情况告诉你们，然后让你们一个小组去讨论去。这些小组呢应该是有 8-10 个同学，它就假定说一个人是书记，一个人是省长，剩下的是副书记、副省长，然后每个人都分管不同的领域，有的管教育，有的管卫生什么的，然后你们那去讨论，就讨论刚才提到这些问题，然后全班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让各省的这些假定的书记省长们讲你的省应该怎么去克服那些困局，然后还得不要被北京摘掉乌纱帽，你还不能够破底线，你还得符合中央的一些基本的发展政策，同时你还要解决你自己的一些难题。让各省站起来说，说完以后呢，老师进行评议，就是哪些是切实可行的，哪些是根本不可行的，如果你这么做，你可能乌纱帽就没了，如果你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把你未来可能要实践的一些东西已经提前放到课

堂里面来进行讨论，而不是说像我们，我们学了一大堆书本知识，然后呢跟实际情况完全不接轨，你出去以后你才开始了解你所工作的那个环境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它是已经开始教你你怎么解决，假定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里你怎么解决这个情况，它是实践性教育。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当然它也有纯粹的我们叫 academic 教育，就是学术性教育。学术性教育就是研究，然后这两个教育是分的特别清楚同时又具有联系。就是 academic 教育主要是提供理论和解释，而实践性的教育主要是解决问题，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问：一个学生这两种教育都要接受还是说分开两拨人？

张：你可以选择，academic 教育是比较高的学历，比如说你要读大部分的博士学位，可能你要在这，但是大部分的硕士以下的学历，你完全可以通过刚才我所说的职业性的教育。比如举哈佛法学院的例子。法学院它的硕士以下的这种毕业生，当然硕士就是你必须要其他的本科学历的条件，你才能进入法学院。所以它法学院的第一个学位叫 master of law，或是 doctor of law，但更高的是法律科学学位，也就是法学院有三级学位，而那个最高级的也就是

我们通常认为的是博士学位，当然跟它的名字不同，最高级的那个大概一年只能毕业一两个，可是它 master 以下的这些法学院的学位一年毕业好几百，就是一个法学院里。你就可以想一想它从事学术教育的比例跟实践性教育的、职业性教育的，就是给你一种技能这种教育的人数的比例，他们差别特别大。

问：他们从事学术的这一拨人，根据您的了解，他们有没有那种读到博士之后不食人间烟火，对于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只是从他书本了解比较多，他自己的体会非常少的哪一种人？我记得于建嵘老师说过，一个法学的博士竟然不知道顾准是谁，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从法学博士不知顾准谈起，他觉得这种人折射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失败。

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不要说顾准，因为顾准是之前的学者，虽然他的确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但是不一定是你这个专业的，所以有可能你不知道，就即使是你这个专业的，比如昨天我看那个上海就是原来邓正来他们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个宣传他们研究院的刊物，它写到俞可平，就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学者，现在还在，还很年轻，并且应该说他的研

究方向跟上海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方向还很接近，不是说其他领域其他学科，但是他介绍俞可平的时候，它说俞可平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他主要研究的是产权经济学。我一看，他把张维迎的介绍全部都放到俞可平的身上，完全搞错了。这就说明，他完全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学科的不知道还情有可原，或者说比较早期的，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潘光旦是谁，如果社会学的，还情有可原，因为那是早期的，只是说你社会学史没有学好。就是当代的他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觉得非常普遍。

问：这不就是专业分工分到一种极致的时候，一个人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狭隘，他研究的只是属于学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就像沈原老师讲的要研究中国的“真问题”，他所针对的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些研究太浮泛，只是从学科内部的一种研究，但是这种研究的结论好像和我们中国现实隔着一层的感觉。

张：我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我同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批评，但是我也不能全部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要区分情况。我刚才说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这种严重的脱节，教育使得学生脱离社会，这种问

题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发生在中国的领域。你不能说这是一般性的教育的现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有些教育不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特别有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跟社会的“真问题”是个什么关系？这是我想提出来的问题。比如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你们都看过这个电影，它是组成一个小分队，到那儿去把一个母亲最后的一个还活着的儿子从前线安全的救回来这么过程。这个电影讲的是这个是个问题，讲的很多很惊险的故事。后来那小分队的人牺牲了大概有一半以上，最后才把那个儿子非常安全的救回来。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把这个故事看成是一个社会、看成一个实践当中的问题的话，那什么是学术问题呢？这个电影在讨论很多学术问题。比如说，有几个人想开小差了，当看到战友牺牲的时候，因为这个太艰难了，他们要度过很多艰难险阻，他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值不值得，就是说，花这么多人的性命去救一个人的性命。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他就跟他队长说，我们是不是值得这么做呢，你看我们战友一个一个在牺牲，而且牺牲的人比我们救的人要多，我们值得不值得

这么做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价值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把五条生命与一条生命相比较，然后比较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那一条生命就比我们小分队五条生命的价值还要高呢？这些是学术问题，是伦理学是哲学的问题。那它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中抽离出这种学问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些学生或学者是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你说这个问题跟事实没有关系、跟社会没有关系，不对的，它有。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报纸上曾有一次讨论，有一个年轻人他跳到水里去救起一个老年人，那老年人掉在水中，处于危险当中，他救起老年人之后自己牺牲了。后来报纸很多讨论说，这个不值得。一个年轻人牺牲了，结果把一个老年人给救上来了，但有的人就说，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他确实应该救，后面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但事实上这个学术问题跟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做出选择，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是息息相关的。那个小分队之所以能把任务完成就是因为他们最终统一了想法，他们通过这样的讨论说服了大家，也就是说解决了这个学术问题以后，行动就变得更容易进行，要不然很多人就觉得不解。这种关联，我相信不

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就是一个学术问题跟一个实际问题、一个社会本身的选择、行动、制度是非常相关的，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所以，一部分人会觉得研究那些学术问题没有意义，但我认为，它是有用的，它其实是有关联的。有一些抽象性非常高的问题和一些经验性非常高的问题，后者就是社会的问题，前者就是相对来说学术性较高的问题。它之所以发生了这个断裂，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是我们的学者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不是它们本身没有联系。它们本身是有联系的，你不能说那些不是经验问题就不是真问题，只是说你没有认识到它的确是真问题，不过它的抽象性水平更高。所以你看上去它在讨论人生的价值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每个人的行动选择。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教育确实是使得学术问题与实际问题相脱节，这样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学术问题跟普通的社会实践问题有距离有差别，这是正常的。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徐海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阿东的小午报

采访者：张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编辑：丁香的耳朵

史苑钩沉

纸片里的半百时光：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故事

图书馆闭架借书处左前方，背阴里静立着几排暗黄色的老旧木柜，每个柜子被分割成整齐的小抽屉。来借书的人来来往往，鲜有人拉开其中任意一个小抽屉，翻翻里面或手写或油印的卡片。虽然它们与机读检索区相隔不过两米。

兴于五四，衰于世纪末



在如今的北大图书馆读者目录中，虽然 1989 年以前编目的西文图书目录，和 1991 年以前编目的中文图书卡片目录中的绝大部分，已转换回溯为机读目录，但有少部分还没有加工转换回溯，其中还不乏极为珍贵的图书资料，而所

有日文和俄文文献目录都需要查询卡片目录。

早在 1931 年毛准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七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便已首创性地公开使用卡片目录的形式进行图书分类。这种目录于二十年代初传入我国，并在五四运动之后，日渐流行于新式的图书馆之中，北大图书馆便是其中之一。

毛准主持工作期间，修订了各种规章制度，使得图书馆对读者的服务更为灵活周到；同时他组织编制了各种书目，着手建立了完善的卡片式目录体系，这便是图书馆卡片式目录检索区的缘起。

在电脑还没有被应用于图书搜索的年代，读者只能在图书馆查阅目录柜里的卡片，再根据卡片上的信息填写索书单。卡片上通常记载着馆员们按照分检的顺序填写的书籍信息，如书名、著者、出版年份、书架位置等。

此时的图书馆还偏居于沙滩红楼北面的松公府临时馆舍，到了冬天室内阴

冷潮湿，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读者苦不堪言。到1935年新馆建成，严文郁任图书馆主任，因为经费充裕稳定，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完成，编目制度得到了改进。

1995年9月5日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不再制作提供新的卡片式目录，但关于卡片式目录的故事却没有尘封在故纸堆中。

刻蜡纸、拉油墨的岁月



图书馆现有的卡片目录是分批制作的，最早的是手写，后来变成油印，最后则是打印机印刷出来的。

在馆长办公室的会议室内，我们见到了曾经负责过卡片目录整理工作的刘丽静、周淼两位老师，见面伊始，两位老师就连声说道：“新打印的卡片我们有参与，好多老的卡片的事情师傅退休之后都不知道啦。”

刘丽静笑道，“那时候唐师傅、张师傅这些老同志，连第一排放着那几个字，第二排放着那几个字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可找不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两位老师所提到的张师傅——张文鸾老师，已是年过古稀，满头银发，提起倾尽一生心血的卡片目录，她滔滔不绝，“七几年吧，具体记不清了，那会儿刚调来北大图书馆，就跟着几个快退休的老先生做编目工作”。张文鸾停下了片刻——几位老先生而今都过世了，当年还是年轻人的她们也都老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油印卡片，新书来了，编目部就忙开了。有专门的卡纸，我们要照着卡纸大小裁蜡纸，”她探起身子，一边比划着卡片的大小，“然后唐老师就往蜡纸上刻字，刻完了刷层墨就可以印啦。每本书大概得印三张卡备着，22个院系图书馆的卡片也得我们做，所以有时候各院系拿走了，我就得赶紧再补抄两张。”

在当时，编目部分为中文部、俄文部、日文部、德文部和加工部，时任编目部主任的成素梅则是同期的老师中字迹最漂亮的。1975年图书馆由档案馆的所在地搬到了静园东面，即如今图书馆的西侧。很多原来没有卡片的书籍都要

补编，“那一阵可把我们忙坏了，整天刻蜡纸、拉油墨”，张文鸾回忆道。

当我们感慨如今没什么人再用卡片查询时，张文鸾点头，小声说道：“当年加工卡片的时候，我是做最后一步工序的人，没想到我们这一代也成了卡片编目者的最后一代。”

东配殿的故纸堆



刘丽静、周淼两位老师都是在 86、87 年左右到北大图书馆，负责编目工作，那也是卡片目录在北大使用的最后几年。

那时卡片目录的制作已经改了打印。但偶尔机器坏了的时候，工作人员也只能到专门做图书卡片的北京图书馆买，手抄一部分然后复印。

谈起那段跟着师傅们一起整理卡片的日子，两位老师都笑了。周老师对记者说，“我们来的时候大多数卡片都已

经不是手抄的了，不过可别以为印卡片就简单，那时候油印要自己调油墨，印完一手黑。打字机就更难了，都是找出那些字一个个敲上去的，跟活字印刷似的。”

90 年的时候开始建电子库，把卡片上的图书信息录入电脑，92 年电子检索系统就投入了使用”，刘丽静向我们讲述起卡片目录的发展历史。周淼在一边补充到：“电子检索系统刚投入使用时，有几年都是双轨制，两边都能查询，2000 年，对外就停止卡片目录的查询了，到 05 年，内部也停止整理和查询。”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卡片目录检索处这样一个地方，却鲜少有人会真正使用它，毕竟，比起方便快捷的电子检索系统，这些泛黄的卡片码得再整齐，也难掩其查询过程复杂的事实。

当初录入的时候，有一批老书没有录入到系统里，也许哪一天这些录入工作都完成了，这些卡片也会被搬走另外保存起来吧。”周淼这样说到。

来源：北大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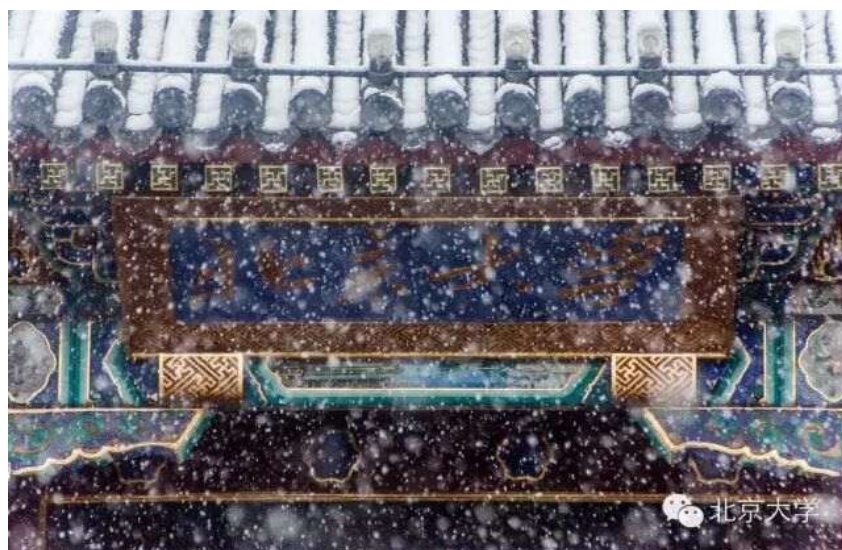
作者：杨文轶 陈祎 陈昌媛

大美北大

金秋九月廿五 燕园 初雪

北京难得下雪，更难得十一月下雪。爱下雪也爱赏雪，爱生活所以冻得手脚冰凉也能倔强地举起相机一张又一张地拍。

每当第一场大雪飘落燕园，总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油然而生。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张首登、董启飞、付际、王铖（文中照片均摄于北大校内）

来源：微信号 北京大学

摄影：陈矿、陈方平、陈
丽芳、王奕文、周心怡、曾亮、鲁扬扬

学员心声

2015年毕业生返校感想

2015年7月13日到15日，我有幸返回北大母校参加毕业典礼，在整个过程中，老师给予我们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细到我们所有返回母校的每条路线的每一个公交站点的每一个出口都给我们详细的指明；细到分发到我们手中的每一张餐票都细心的叮嘱，生怕我们不够吃、吃不好。母校老师的行动，就好像一位母亲，在迎接她在外漂泊多年未归的游子，那种亲切，使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回家的感觉。可以说，我们返校的同学之所以能够轻松愉快的参加毕业典礼，完全是母校和带队老师们辛苦准备的结果。而我们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老师们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从母校老师们所做的点点滴滴，使我也感受到了北大人那种严谨细致的学习、生活作风。

而龙老师，不远千里，带领我们返校，吃住跟我们一样在学生宿舍，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所有人肃然起敬！短短的两天生活接触，我深

深的感受到，龙老师对我们深圳几个返校的同学，就像送几个自己呵护多年的小孩上大学的家长一样，目光中闪烁着欣悦还有一丝担忧，而这种真情的流露，只有身临其境和一瞬间能够捕捉到。而我希望，我们几个的表现没有让龙老师失望。

返回母校，看看母校，是所有北大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年深圳只有我们五位同学返校，我想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几个有多么的出类拔萃，我更毫不怀疑比我们优秀的同学还大有人在，从和老师的交谈中，我们也了解到，老师也是尽力的为我们深圳争取更多的名额，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只有五位能够成行。我希望，暂时没能返校的同学，心里不要难过，毕业，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恰恰相反，北大毕业，是我们每一个人新的开端，日后的学习生活中，需要我们以行动证明和维护母校的声誉。只要我们心中装着母校，时时刻刻按照北大的要求做人、做事，那我们就

是一名合格的北大人，当我们失意时，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像北大校友蓝色光标董事长赵文权在毕业典礼上所讲的一样，不忘初心，才能始终坚持

自己的理想。而北大最需要的，就是有理想的人，真正的北大人，是属于那些有家国信念的人。

深圳中心 2015 年毕业生
黎颖